

“角色转换”:隔代抚养中进城祖辈的角色困境及消解路径研究

朱 涛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现代城乡发展、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的转变令中青年一代在育幼方面逐渐弱化,使得进城祖辈在孙辈抚养中仍有突出的价值。结合米德提出的角色理论,在构建进城隔代抚养祖辈生活困境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剖析进城隔代抚养祖辈的身心压力大、身份适应慢和社会融入差等问题;依托“角色转换”理论分析框架,联系社会现实,提出祖辈生活困境消解路径:提高个人能力,加快祖辈身份适应;增强家庭支持,减轻祖辈身心压力;完善社会政策,促进祖辈社会融入。进而实现社会角色的有效转换,消解个体困境。

关键词:隔代抚养;进城祖辈;角色转换;消解路径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0)04-0035-07

一、问题的提出

自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要让人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而我国正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生活质量应是养老生活中追寻的重要目标,因其影响着中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1]。根据近些年的统计,绝大多数的城市夫妇需要依靠自己的父母帮助照料幼儿(3岁以下),而将近1/3~1/2的家庭是由祖父母作为幼儿的主要照顾者。可见当代祖辈群体外迁入城进行隔代抚养的现象十分普遍,祖辈尤其女性祖辈群体已经成为家庭抚养的主力军,反之隔代抚养行为本身也在影响着祖辈群体的生活质量。而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祖辈群体,现今进城隔代抚养中的祖辈群体体现出了代际关系更为复杂、年龄构成更细化、个人需求更多和社会期望更大等特点。如年龄构成上这类进城祖辈群体不仅仅指老年人,也包含一定量的中年人,这是区别于我国法律中将“60周岁及以上”就定为老年人的一种说法。这些情况的存在,就使得无论是个体还是社会层面的问题敏感度都将变得更高,不过这也意味着可操作空间也会随之

增加。所以面对我国这样大体量的中老年群体,关注隔代抚养背景下的个人生活状况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的持续发展,进城隔代抚养逐步成为社会热点现象,作为进城隔代抚养主体的祖辈群体其自身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从问题发端而言,主要包括个体原因和社会因素两方面:一是个体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凸显,个体行为受社会变迁影响;二是祖辈群体经历的角色转换等问题不仅仅包含社会因素,更有祖辈进城后个体角色转换的原因,而其中最大的影响之处在于个体对个体角色的转换上。江川认为社会转型背景下年轻父母们因面临巨大生活压力无暇照顾后代,而祖辈赋闲在家成为了抚养的承担者^[2]。不难发现目前国内的成因分析多基于社会变迁的影响,即隔代抚养相关问题的产生与外部存在必然联系。而国外相对偏激的观点认为隔代抚养是由父母离婚、犯罪入狱等非正常因素引起的^[3]。正反面也都表明了隔代抚养是年轻父母压力的转接点,降低了养育成本。就抚养行为来看,卢乐珍将隔代教育进行分类,并肯定身教与民主型使祖辈能够发挥正向引导效应,利于祖辈家庭新角色的适应,利于个人生活适应能

力的提升^[4]。此外,薄赢指出隔代抚养是一种代际性支持的正向体现,对老年人的客观健康和主观健康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有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的作用^[5]。而在经历进城生活后,出于个体对于个体角色转换的原因,进城祖辈群体相对独立的个体生活角色得以转换,变成家庭的新抚养者,彼此联系加强,并具备了一定的角色转换目的,使得隔代抚养行为的增加与子女赡养老人行为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6]。由此,隔代抚养不仅可以提高年轻父母资本积蓄,对于社会层面的养老负担也有减缓作用。由此可预见的是,通过对进城隔代抚养中祖辈角色困境的分析和介入,有利于理清新时代背景下家庭成员角色转变逻辑、明晰社会政策或制度调动下家庭传统互助纽带背后的机理规律;就现实状况来看,介入并期许解决进城隔代抚养中祖辈角色困境问题,是提高家庭生活满意度及社会群体福利的重要努力。综上,研究进城隔代抚养现象对于个体家庭的发展和社会政策的转变具有重要的政策和理论意义。

从学界的研究来看,隔代抚养主题研究最早发端于国外,1993年上官木子在《父母必读》中初次提到“隔代抚养”一词。而伴随中国社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区别于传统农村隔代抚养的进城隔代抚养在国内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在最近几年尤为盛行。纵然隔代抚养现象已经得到了广泛关注,然学术界的学术旨趣多集中于祖辈群体的现实状况研究,且缺乏理论视角的分析,而对于如何改变祖辈群体困境,已有研究也缺乏相对的处置方案。此外,学界研究对象多为儿童,对祖辈的困境分析较少。另,隔代抚养行为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如对祖辈个体行为和思想的不确定影响,与此同时,社会基础性服务与实际需求的不对等也常被诟病,致使隔代抚养祖辈群体仍面临着诸多困境却不得消解。综上,对于隔代抚养中祖辈群体的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研究必要性和价值意义。本文尝试运用角色转换概念,强调新时期背景下个体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及祖辈进城后个体对个体之角色转换的影响逻辑,来理解与介入进程隔代抚养中祖辈群体面临的生活困境。

二、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1. 理论视角

角色理论最早由“角色”一词而来,而“角色”来源于戏剧,指演员在戏剧舞台上按照剧本和导演规定扮演的某一特定角色。伴随时代的脚步,米德就将“角色”引入了社会(心理)学中,认为个体是在大型的地位网络中扮演与自己位置相关的各种角色,并在《自我与社会》一书中进行了较为全面地解释和说明,目前学界对于角色理论的定义不尽相同,但多数时候被理解为一种试图从人的社会角色属性解释社会心理和行为的产生、变化的社会学理论取向^{[7]32}。换言之,人们依据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等条件,并按照自己对于一些特定角色的理解、期待对个体行为进行认知解释。笔者基于角色理论提出“角色转换”概念,这是一种试图从人的社会角色属性解释社会心理和行为的产生、变化的分析视角,主要认为个体活动在与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下会带来个人社会角色的转换,而角色转换从起始至结束的过程存在成效性,成效好坏与个人生活状况相互勾连,进城隔代抚养祖辈生活困境的出现实际上是祖辈本身社会化的失败,而这种社会化的失败源于祖辈个体生命历程中社会角色的紊乱及转换失效。

2. 理论分析框架

角色理论为社会具体情境下个人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分析提供了助力,隔代抚养作为特殊的社会现象,被研究群体困境的产生与其生活角色转换的成效性相关,即生活困境与角色困境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耦合性。角色转换,即社会个体社会角色适应或转换的过程,且转换的过程存在效果好坏,转换成效高,意味着个体角色转化中不易产生困境,形成“角色转换高效”;反之则形成“角色转换失效”。就进城隔代抚养中祖辈角色困境的分析来看,角色转换的视角分析多立足于社会整体大背景,抓住了因进城隔代抚养而带来的角色转换困境这一核心点,认为“角色转换失效”与因进城隔代抚养带来的诸多困境相关,且主要问题表现在“角色冲突”“角色认同”和“角色扮演”中;而“角色转换高效”的有效保证同样受诸多因素影响,主要包括

“角色能力”“角色配合”和“角色环境”。角色转换是问题视角下的概念界定,它可用于问题源的理解和解决思路的研究。在隔代抚养祖辈群体的困境分析中,从角色理论出发,并认为“角色转换失效”是个体角色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在问题解决环节,角色转换亦可提供相关思路,其中可以认识的是角色适应或转换的成效性与困境相连,如何形成并保证“角色转换”的有效性就是如何解决困境的过程,这便形成了一个相互勾连的架构。

根据角色理论和角色转换等概念,从角色认同、角色冲突和角色扮演等角度探讨影响祖辈群体生活困境产生的潜在因素,为今后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依据,具体分析框架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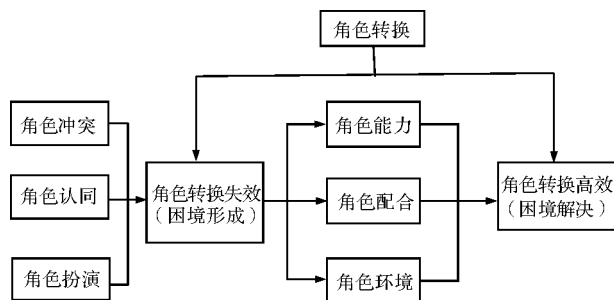


图1 “角色转换”理论框架分析

三、角色转换失效：困境产生的内 生机理

基于乡村社会的传统文化和当前社会的发展认知,隔代抚养行为常被认为是后代兴旺的体现,而子女工作繁忙也成了炫耀的“资本”,这使得隔代抚养行为被赋予了一定的符号意义及时代意义。沈卫华就认为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祖辈比较愿意抚养后代并将其认为是自己的义务去履行^[8]。诸如此类的原因导致很多老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离开农村原籍,开始了进城隔代抚养的生活,从家乡进入了“他乡”,进行着角色身份的转换。戈夫曼曾指出,行动者进入角色需要获得角色认可、具备相应能力和积极投入角色^{[9]15,19-20}。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个体角色的转换,进城隔代抚养祖辈面临着诸多生活困境,而其困境产生的内在机理就在于祖辈个体生命历程中社会角色的紊乱及转换失效。具体来看,“角色低效”主要来源于“角色认同”“角色冲突”和“角色扮演”。

1. 角色认同：身份适应慢

个体角色的认同包括自我层面的主体身份认同和社会层面的客体身份认同,而隔代抚养行为的特殊性使得家庭因素也成为个体认同中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但此时祖辈面临的角色转换困境主要在于难以短时间内适应“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身份转变。从传统角度来看,由于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作为农村人的事实令很多人无法忘怀,反之,“城市人”被认为是财富地位和知识的象征,更显距离感。可见,纵然进城隔代抚养成为事实,进城祖辈们仍倾向于自己是农村人,城市只是短暂居住的场所。“身体上的城市人”这种内生标签已然深深扎根于心中,此谓旧角色强认同感。从社会环境来看,由于针对进城隔代抚养群体的管理存在着制度性的缺失,且表现出相对于城市群体的区别对待特点,导致了此类群体存在着被边缘化的倾向;另原城市中隔代抚养群体对进城隔代抚养者也有排斥性情绪存在,这种同类群体的情感冲击加剧了祖辈自我的角色认同压力,这些都是新角色弱认同感的重要体现。除了外在环境的压力外,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我国家庭环境已然发生变化,其中祖辈群体的主导地位正在逐渐丢失,家庭结构也正慢慢向核心化转变,由此进城隔代抚养的祖辈在家庭中更多时候是辅助者的角色,受家庭成员的影响,这种代际差异可能会让老人产生“外来人”的感受,这种由主导者到辅助者的个体角色转换必然是离散于核心家庭之外的。在子女的诉求下,祖辈个体角色的突然转变也值得关注,来到一个新的家庭环境后,祖辈们已经从相对自由者再次成为城市新家庭的照料者,这样的角色转换让其难以短时间内得以应对,加之进城祖辈在面对陌生环境时体现出了个体能力不足的困境,如新城市生活的未知性、如何更有效进行隔代抚养和如何缓解调节新生活压力等问题,对进城祖辈的自我角色认同形成了巨大阻力,导致了新角色身份的慢适应性。综上,通过强弱认同的比较及进城隔代抚养祖辈的能力分析,足见进城祖辈群体在角色认同和适应方面仍面临着诸多困境。

2. 角色冲突：身心压力大

抛却社会生活环境转变的因素,进城祖辈生活中的个体角色转换也成为了其问题的来源。进入

到子女生活的新环境中,他们与早前一样是自主生活的个体,但受子女委托,如今更是肩负着家庭抚养责任的家庭支持者,而诸多角色的涌现与转换,促成了角色冲突的产生,在此过程中,他们又面临着巨大的身心压力。就家庭环境而言,全家对祖辈提出更多要求,对孙辈的成长给予厚望,从教育到日常起居都不容许存在过多的差错,加之更多时候祖辈还要照料儿辈的生活,一家人的生活起居就落在了祖辈的肩上,这无疑加重了祖辈的身体负担。而新观念的产生也在无形之中成了相关现象产生的助力,“隔代亲”行为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尤其在当今的“90后”中体现为甚,而祖辈也往往在照顾孙辈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成就感,祖辈们仍然倾向于帮助后代进行孙辈的抚养,愿意接受抚养者的角色。所以伴随生育政策的开放,我们有理由预见隔代抚养或会成为更被普遍接受的抚养方式,这就预示着祖辈群体将面临着更大的身体压力。而区别于传统的社交环境,陌生环境的改变让老人在固守和改变中产生矛盾心理,在家乡与他乡的定位中思索不前。对于祖辈的心理压力也常常来自家庭内部,两代人由于各自观念认知的差异,进行着传统与现代认知的博弈,并常常会形成认知冲突,由此代际关系中的协商机制面临崩塌,祖辈往往更易陷入心理困境。角色理论承认角色距离的存在,即祖辈群体由于在语言认知、文化习惯等方面的不足,在进行城市生活时会出现角色距离感的心理落差和旧角色的心理冲突,而这或会成为心理压力的来源。所以如何在保证良好的身心状态下,进行合理适度抚养是家庭需要考虑的问题,反之,角色冲突将进一步影响祖辈们的身心压力。

3. 角色扮演:社会融入差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农村社会的差序格局状况,人与人的关系似石子入水时所散波纹般,越远也越薄,这种情况在城市社会中似乎也同样适用,而进入新环境必然要走进新的生命角色,并开始角色扮演的过程,米德认为随着社会化的不断发展,社会就如一个大舞台,每个人在上面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也是对于角色扮演的解释,但在角色扮演中同样存在诸多阻碍,影响着个人的社会角色融入。从宏观角度来看,进城祖辈仍难忘“故土难

离”的传统观念,碍于空间距离的制约,出现了传统村落式社会关系网的逐渐淡化、新的成员尚未加入和互助网络逐步缩小的情况;加之我国户籍制度的限制和社区服务制度的发展不完善,使得在社会个体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从乡村居民到城市居民这种单方向的主动社会融合存在着诸多困难。此外,从个人角度来看,个体社会融合过程与个人角色扮演过程存在着重要的联系,在新家庭及子女的主要需求介入下,祖辈们往往是从被赡养者转变为进城家庭的抚养者,这便为进城祖辈的角色任务提前进行了定义,而这二者之间的个体角色转换再次说明角色转换问题不仅仅与社会大背景相关,更与祖辈进城生活后的个体角色转换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最重要的是隔代抚养中的祖辈被赋予了更加强烈的责任感,即隔代抚养下的社会交往需要为养育活动让路,防止二者存在矛盾,这便使得祖辈群体的新市民角色扮演出现问题,并主要体现在社会融入上。戈登、盖茨和斯科特曾提出过一个闲暇生活的体系,按参与效果由低到高分别是放松休息、消遣、发展性活动、创造性活动与肉体超越^{[10]157-158}。总体而言,隔代抚养中进城祖辈进行社交活动的环境多是周边小区或是适合孙辈游玩的场所,体现出了由住家向外辐射的特点,而进行社会交往的方式多限于聊天或者散步,从严格意义来说这只是放松而已,也体现出了其社会交往的低层次和小范围性,这显然不利于社会融合。更为有趣的是有学者认为中老年群体通过照看孙辈获得子女在精神或物质方面的支持,使隔代抚养行为成为代际交换的条件,子女养老行为也随之增加^[6]。隔代抚养涉及代际互动,而这样的特殊背景也导致了进城祖辈将主要时间放在了抚养上,无暇也无心进行多余的、更为深层次的社会融入活动,表现出了社会交往的“内倾化”特点,这也体现了新群体的角色转换过程除了受自我因素影响外,更有赖于多元社会主体的共同帮扶和推动。

四、“角色转换高效”:困境消解的路径探寻

结合相关社会现实和学术研究,可见进城隔代

抚养已然成为了现代多数年轻群体所推崇的抚养方式。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尤其对于进城人员来说,他们难以得到更多资源性的支持,社会参与和角色适应难度更大,加之个体对于角色转换的影响,因此祖辈群体也面临身心压力大、身份适应慢和社会融入差的困境。笔者针对进城隔代抚养对于祖辈群体所产生的生活困境,基于角色转换视角,提出相关可能有利于缓解或解决这一困境问题的意见。

1. “角色能力”:提高个人能力,加快身份适应

角色理论多次回应个体因素在角色实践中的重要性,个体因素即为个人能力,包括自我认知外在表现言语行为等,而这也是困境解决的着力点。于进城隔代抚养的祖辈而言,角色能力是指其在进城隔代抚养的背景下,为适应新环境而体现出来的个体语言、文化认知和生活适应等个体特征,换言之,此时祖辈的更多能力成长与隔代抚养相连。关乎祖辈群体的新身份适应问题,主要包括个体角色认同的不足和个体能力的缺失。面临生活环境和生活重心的转变,祖辈难以在短时间进行自我能力培养,进而满足延续性的隔代抚养情境需求,那么则需要进行祖辈群体的相关能力培养和支持。综上,在个人层面上,祖辈们需要形成良好的思想认知,主动进行自我对话,形成新生角色的主观认同,多进行心理和实际层面的角色适应活动,此外,传统家庭尤其是年轻父母应主动关注祖辈群体的自我观念转变,引导其形成正向认知能力,通过认知改变实现隔代抚养的新角色、新环境的初步适应能力提升,并根据祖辈自身情况合理对其进行生活安排介入,要注重家庭个体成员对于其他个体角色转换的影响;而对于个人能力的培养,主要包括如何更加有效和明确地进行隔代抚养、如何进行家庭成员间的理性对话、如何进行情绪的自我管理等,可通过对话交流和借助社区资源力量等措施,更快地进行角色认同和自我能力培养。如政府和社区组织可积极组织相关政策性支持活动,如形成政策法规保障进城祖辈社会学习资源获取权利,进行以社区层面的个人能力培训课程,不仅可以提高祖辈群体新环境适应能力,还有利于提高祖辈群体的个人能力,进而提高角色认同,加快新角色适应。

2. “角色配合”:增强家庭支持,减轻身心压力

伴随隔代抚养的产生,祖辈们面临着巨大的身心压力。作为祖辈群体,其社交朋友圈层较为固定化,且多是“血缘”与“地缘”的集成,即多为“故乡”生活中的老朋友,但时空的隔离促使其原互助体系的破裂。当前城市环境下,社会群体内部分化和人情淡薄成为了人际社会的代名词,也在无形中形塑了群体交互的隐形鸿沟,这对进城隔代抚养的祖辈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并主要体现在弱化社会融入上。在我国,以血缘为纽带的扩展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是异常紧密的,而社会人的人格特征又给互助群体的构建设置了障碍,如何调整移居后的家庭角色、互助群体角色并发挥相应的功能,这需要家庭成员的帮助,其中年轻父母可积极发挥自身中介者的角色,在隔代抚养的过程中发挥着“润滑剂”的作用,即通过不同家庭成员间的“角色配合”来进行问题的干预,其中对于祖辈群体的理解和支持十分重要。一方面,家庭成员,尤其是年轻父母对祖辈父母应设身处地地理解,理解抚养的困难和个人的想法,尤其在孙辈的抚养问题上应努力达成共识,祖辈与年轻父母应共同关注孩子的成长;在日常生活中,多进行思想交流,如鼓励老人多进行社交活动和对外联系,这有利于摆脱传统的“血缘”交际关系,形成“趣缘”的社交关系,从而减轻祖辈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年轻父母应适量减轻祖辈抚养工作量,主动进行责任和义务分担,共同构筑后代抚养的保护壁垒,这样对于弘扬年轻父母抚养主体意识的培养和减轻祖辈群体的抚养压力有着重大的意义。

3. “角色环境”:完善社会政策,促进社会融入

基于当前社会现状,如许多欧美日等国家一般,老年群体被视为社会发展的银色资源而得到重视。很多年轻父母在权衡之下,将子女抚养的工作交给了父母,但同时对祖辈群体的社交活动和社会融入产生了冲击,尤其是进城隔代抚养中的祖辈群体,他们在此方面的困境更加明显,社会支持需求也更大,而当前很多社会政策的排他性却与之形成冲突。对于进城隔代抚养中的祖辈群体或者家庭,有必要倡导因地制宜地进行相关制度设计,进行必要的社会保障和政策支持,以减少因制度因素而导致的群体生活困境的产生,从而促进祖辈群体的社

会融入,提高个体生活幸福感。基于文题研究背景下,“角色环境”被认为是围绕着迁入地的外部生活环境下,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综合体,诸如社会大环境背景下的群体行为、制度政策等。区别于一般性支持,社会层面的支持具有广泛性和制度性的特征,制度、文化等多元化的社会支持也是满足个体需求的必要元素,这与角色理论中强调的情境性支持不谋而合。对于进城隔代抚养祖辈生活困境的环境分析,主要有社会政策环境和社区生活环境。一方面,地方政府可倡导、扶持、建立面向隔代抚养祖辈群体出台相关抚养支持政策,可包括家庭教育与生活救助等,如美国就曾出台“亲属抚养协助计划”,这不仅仅减轻家庭抚养负担,更加有助于解放祖辈群体的双手,进而获得更多的进行自我休闲和社会融入的时间和精力;而后代抚养的主体——年轻父母也应该受到关注,毋庸置疑的是年轻父母在后代教养上具有更大的优势,但隔代抚养的产生多由年轻父母自身因素导致,因而给予年轻父母更多的工作弹性机会就变得十分必要,如制定相关政策,要求在特殊节假日或时期进行一定的抚养关怀补助等,让年轻父母能有更多机会去陪伴孩子,由此形成“政府-家庭”的双向养育体系,这样也更利于祖辈群体扩大社会交往,促进其社会融入。另一方面,除却宏观社会政策环境外,社区生活环境的支持也十分重要,在社区等基层服务组织中,重视外迁人员的人文关怀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主要包括基层服务资源共享的合法和规范化管理,其中社区可联合社会服务机构与志愿者组织开展各项与祖辈相关的活动,如知识讲座、联谊活动和入户交流等,更可以包括社区层面的智慧管理,如社区委可以为祖辈提供有效的互联网平台服务工具,通过互联网的力量实现便捷抚养活动、有效人员联合和智慧社区管理的目的。综上,对于减缓祖辈抚养身心压力、提高个人认知和提升城市归属感有着重大的实践意义。

五、结论与讨论

将隔代抚养问题立于社会整体中进行思考,并专注于进城隔代抚养中祖辈群体的生活困境问题分析及应对研究。基于社会城乡发展背景,提出“角色转换”视角,通过多层次主体的介入进行问题

的应对分析,旨在走出单一的家庭研究视域。区别于传统养育背景,“隔代抚养”的现代教养环境使得教养主体已经出现转变,且因教养主体的转变对个体及家庭的成长带来了诸多挑战。伴随老龄化的进一步发展,隔代抚养中祖辈群体的生活状况也受到更多的关注,而祖辈群体对于隔代抚养现象往往呈现出极大的热情,使得隔代抚养尤其是进城隔代抚养养育实践广受欢迎。但不得不说现代社会在带来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在影响着观念的改变,作为现代核心家庭中的抚养主体——年轻父母,个体意识更强,更注重个人精神世界的追求,对于后代传承与教养热情似乎正在消散;与此同时,社会也并未对于抚养主体的相关权责做出制度性的回应和规制,反之正渐渐地默许着“隔代”力量对幼儿抚养现实的形塑作用,这也是目前隔代抚养问题最大的症结所在。社会力量因素形塑的养育压力在此时多被祖辈承接,加之社会个体对于进城祖辈角色转换的影响,使得祖辈群体极易陷入诸多困境。

中国的传统话语体系实践表明,人们更愿意把隔代抚养定性为传统家庭文化如责任意识的自然延续,或者完全归咎于社会变迁中的负面效应,但这样的解释似乎有些牵强。中国传统家庭主张“男主外,女主内”,至少保证父母一方在承担着后代的抚养工作,而伴随着国家的发展和社会观念的不断转变,女性群体也得以解放,由此抚养工作又有转到祖辈手中的趋势。笔者认为,就进城隔代抚养问题而言,反映着社会个体成员在认知和行为上的微妙变化,其结果是在追求生活时间和抚养成本降低的同时,也给祖辈带来了诸多生活困境。首先,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这是利己主义和责任感的碰撞,而进城隔代抚养的核心症结在于社会个体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尚未成型。其次,在一定程度上,传统家庭亲子关系已经逐渐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意义,个体行为的选择映射着社会发展,就隔代抚养问题而言,这是社会制度性转变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当然,将个体的角色转换完全置于社会层面的研究,这是有失偏颇的,进城祖辈在角色转换方面既受社会方面的影响,更有进城生活后其他个体对其角色转换的影响,如何更加关注个体层面的社会公众发展问题变得极为重要。所以,现代教育和个体情感问题作为社会发展的重点所在,社会有必要

针对隔代抚养,尤其是新型城乡关系下流动人口的相关问题做出一个制度层面的回应,如对社会个体的育儿抚养等方面的权责关系做出规制性的安排、建构现代化家庭保障制度和实行相关入城迁入家庭的权益保障制度,进而实现国家、家庭及个人等多元主体架构下的制度性实践,由此不断改善社会整体的养育现状和老年群体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提升问题,避免新一轮社会问题的进一步扩展,最终,实现进城隔代抚养背景下的多方主体的福利提升和权益保障。

参 考 文 献

- [1] NG Y K. Happiness surveys: some comparability issues and an exploratory survey based on just perceivable increments[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96, 38(1): 1-27.
- [2] 江川. 对隔代抚养的思考[J]. *老年人*, 2005(4): 9.
- [3] 赵梅, 邓世英, 郑日昌, 等. 从祖父母到代理双亲: 当代西方关于祖父母角色的研究综述[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4(4): 94-96.
- [4] 卢乐珍. 隔代教育: 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J]. *家庭教育*, 2004(10): 8-10.
- [5] 薄赢. 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的影响——基于2011年CHARLS数据的分析[J]. *消费经济*, 2016(5): 16-22.
- [6] 李树生, 杨彬. 隔代抚育与子女养老行为选择: 事实与解释[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7(7): 102-107.
- [7] 金盛华. 社会心理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 [8] 沈卫华. 论祖孙关系在幼儿家庭教育中的作用[J].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1(5): 82-87.
- [9] 欧文·戈夫曼.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 冯钢,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10] 戴维·L·德克尔. 老年社会学[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

“Role Shift”: A Research on the Role Predicament of Intergenerational Childcare by Grandparents into the City and the Resolution Path

ZHU Tao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modern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change of production method, life style and cultural concept, the young generation become incompetent in childcare gradually, which highlights the value of grandchildren raising by grandparents into the city. Based on Mead's role-taking theory, the paper establish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life difficulties of the grandparents who go into cities to take care of grandchildren and analyzes problems of these intergenerational childcare grandparents such as physical and mental stress, slow identity adaption, and poor social integration. Combining the theory of role shift with the social practi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ath to resolve grandparents' life dilemma in the manner of speeding up grandparents' identity adaptation by improving their personal ability, reducing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pressure by adding up family communication, and promoting their social integration by improving social policies. It is important to achieve the effective shift of social role to resolve personal predicament.

Key words: intergenerational childcare; grandparents into the city; role shift; social work

【编辑 高婉炯】